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的增改問題再考^{*}

張旭

中國社會科學院

摘要：《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是唐代中晚期由西明寺律僧圓照所撰寫的佛教經錄。本文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梳理《貞元錄》有關的寫本和刊本的版本系統。《貞元錄》的現存文本經過後人的增改，最早發現此問題的事小野玄妙和塚本善隆。本文結合相關增改異文，詳細考訂相應經典的譯出和入藏經過。

關鍵詞：《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佛教目錄、西明寺藏經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唐宋之際的佛教藏經與經錄研究”(21CZJ01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以下簡稱《貞元錄》)是唐代律僧圓照撰寫的藏經目錄。圓照於貞元十五年(799)十月二十三日奉唐德宗之敕命修撰,至貞元十六年(800)四月十五日書成進上,五月十日敕下流行。在《貞元錄》之前,唐代最負盛名的經錄為開元十八年(730),僧人智昇編寫的《開元釋教錄》(以下簡稱《開元錄》)。在《開元錄》之後,《貞元錄》之前,圓照還編寫了一部《續開元釋教錄》(以下簡稱《續開元錄》)。《開元錄》與《貞元錄》的撰成相隔時間大約七十年,其間新譯經主要有不空翻譯的密教經典以及般若的譯經等。《貞元錄》雖為敕撰經錄,且後代有藏經根據其《入藏錄》組織結構,但佛教研究者對這部目錄關注不多。究其原因,約有兩端:一、宋代開始刊刻的大藏經大多以《開元錄·入藏錄》為目錄編纂,鮮有根據《貞元錄》刊刻的。二、贊寧《宋高僧傳·智昇傳》對智昇所著諸錄極力推崇,稱《開元錄》“最為精要”,認為智昇撰諸錄之後,“經法之譜,無出其右矣”。而談到圓照之《貞元錄》則云“後之圓照《貞元錄》也,文體意宗,相鉅不知幾百數裡哉!”¹可見在宋代著名的佛教史家贊寧眼中,《開元錄》是值得推崇的,而《貞元錄》則遠遜於《開元錄》。

自贊寧以來,對於《貞元錄》的批評一直延續至現代學術界,諸人的批評自有其道理,筆者無意為圓照翻案,但《貞元錄》依然有研究的價值,主要有以下原因:一、《開元錄》以後,中晚唐佛教經典的翻譯多賴《貞元錄》保存,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金剛智、不空、般若等人的譯經。《貞元錄》之後雖有南唐恒安編纂的《續貞元釋教錄》(以下簡稱《續貞元錄》),但記載遠不及《貞元錄》詳細。中晚唐以後唐代政局動蕩不安,先有開元、天寶年間的安

¹ (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五〈智昇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5頁。

史之亂，後有武宗滅佛，佛教典籍遭受的摧毀十分嚴重。若無《貞元錄》存世，玄、肅、代、德四朝譯經恐無法詳細獲知。二、前人多認為《貞元錄》體例駁雜，且開元之前的譯經基本是按照《開元錄》原樣抄錄，增加的僅有從開元十八年至貞元十五年的譯經。且《開元錄》的體例是在譯經後多由智昇根據一些原始材料撮要撰寫出譯經僧的小傳，《貞元錄》則將許多與譯經有關的奏章敕令依原樣放入《貞元錄》中，導致譯經的記錄多有浮詞，不堪卒讀。這也造成了在《貞元錄》譯經記錄中，開元十八年之前與開元十八年之後的記錄體例不一。這些批評無疑都十分正確，正中《貞元錄》的要害。但如果轉換視角，從史料學的角度來觀察，這些與譯經有關的奏章敕令實際上幾乎是當時關於譯經的第一手記錄，比普通的僧傳和目錄更為原始，可信度也更高。以往在佛教目錄中被忽略的諸多細節在這些奏章敕令中也得以充分展現，為我們瞭解唐代中後期的譯經增加了許多鮮活的材料。湯用彤先生也認為圓照此書為“善於保存佛教史料者”²。三、《貞元錄》所處的時代為中晚唐時期，中晚唐至五代時期是中國佛教大藏經從寫本藏經至刊本藏經轉換的時期。包括《貞元錄》在內，《續開元錄》《續貞元錄》等幾種在中晚唐和五代時期編纂的經錄對於觀察這一演變過程有特殊的價值。

有鑑於此，在本章中筆者主要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一、梳理《貞元錄》的版本。經過中晚唐和五代時期的喪亂，《貞元錄》在南唐恒安所處的時代，已經難覓其本。後代的刊本藏經多依《開元錄》而非《貞元錄》來組織，與此也有關。職是之故，在刊本藏經系統僅有《高麗藏》保存有《貞元錄》，其他諸藏皆不收。

² “貞元時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集睿宗、宣宗、肅宗、代宗、德宗諸朝制旨碑表，則善於保存佛教史料者。”參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1頁。

但在日本的古寫經中，保存了大量與《貞元錄》有關的寫本，筆者欲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將與《貞元錄》有關的寫本和刊本做一次系統的梳理。二、現存於《高麗藏》中的《貞元錄》實際上經過後人的增改，最先發現此問題的是參與編纂《大正藏》的小野玄妙，此後塚本善隆在一篇論文中專門談到《貞元錄》的增改問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闡明《貞元錄》的增改問題。

一、《貞元錄》的版本與流傳

現存於世的《貞元錄》主要分為刊本大藏經系統和日本古寫經系統。其中刊本藏經系統祇有《高麗藏》本存世。《高麗藏》有初雕本與再雕本之別，此前較通行的是《高麗藏》再雕本，近年來，隨著日本南禪寺和韓國湖林博物館等地所藏《高麗藏》的公佈，人們纔得以一睹《高麗藏》初雕本的面目。《貞元錄》的“《高麗藏》”系統現存兩本：一為初雕本，現藏於日本京都南禪寺，共有十六卷³。二為再雕本，影印本頗多。經筆者的比勘，除了個別字句不同外，初雕本與再雕本的差異不大。

相較刊本系統，日本古寫經系統的《貞元錄》則較為複雜。大正年間，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人主持編修《大正

³ 分別為第1、10、12-15、18、20-23、25-28、30卷。

⁴ 小野玄妙《貞元新定釋教目錄闕文》，《仏典研究》第一卷第三號，1931年；小野玄妙編纂《仏書解說大辭典》別卷《佛典總論》，東京：大東出版社，1936年。此處根據的是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第562頁。除了這兩個版本，小野玄妙還提到“其後得其成實堂文庫本及大谷大學圖書館之入藏錄，又於東寺經藏之新寫聖教中，發現三十卷完備本，因此思於他日一有機會，欲將真正之《貞元錄》介紹於世。”但他在參與編纂《大正藏》時未使用這些版本為參校本，殊為可惜。大正藏對校本另有一種享保十六年刊本，時代較晚，本文不作討論。

藏》，小野玄妙也參與其中。《大正藏》本《貞元錄》以《高麗藏》本為底本，為整理《大正藏》本《貞元錄》，小野玄妙曾用兩種日本古寫本作為對校本，分別為《聖語藏》本、黑板勝美藏古寫本⁴。據《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⁵，《聖語藏》本存第一卷至第二十卷，載《聖語藏》雜寫經第126號，平安時代寫⁶。黑板勝美藏本存第二十九至三十卷，也為平安時代寫⁷。

小野玄妙之後，塚本善隆、宮崎健司、伊東ひろ美等又調查了《貞元錄》的其他古寫本。塚本善隆發現大谷大學藏有三種《貞元錄》古寫本，分別為康和本（卷二九）、永久本（卷二九、卷三〇）和大治本（卷一、卷七、卷一六、卷二四）。宮內省圖書寮藏大治四年《貞元錄》卷十二寫本⁸。塚本善隆提到的以上諸本均為法隆寺一切經本。宮崎健司調查了法隆寺、同朋大學、宮內廳、佑誓寺藏法隆寺一切經本，共收錄了13件寫本⁹。伊東ひろ美綜合了大谷大學藏本與宮崎健司的研究，共列出了22件法隆寺本《貞元錄》（下表稱“伊東”），主要對同朋大學藏法隆寺本《貞元錄》進行了版本學的調查。伊東ひろ美發表了上述論文之後，宮崎健司

⁵ 《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別卷：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一卷，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年，第653頁。

⁶ 《正倉院御物聖語藏一切經目錄》，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別卷：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一卷，第971頁。

⁷ 關於黑板勝美氏藏本，筆者不知其源流與現藏情況。高田時雄先生曾在他的論文中介紹，黑板勝美博士是日本古文書學的創始人。他主持編修了《大日本古文書》叢書，同時還參與真福寺、正倉院、醍醐寺古文書和善本書的整理工作。黑板博士藏本或許與這些寺廟的古寫本有關係。

⁸ 除了以上寫本之外，塚本善隆還提到東寺所藏《五合聖教》中的南北朝寫本、永觀堂所藏本和久原文庫本。但是以上寫本的年代均較晚，本文不涉及。

⁹ 宮崎健司《法隆寺一切經現存目錄》，收入竺沙雅章等編《法隆寺一切經的基础的研究——大谷大学所藏本を中心として——》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1996年。宮崎健司後又對上述目錄進行了增補，將大谷大學藏本補入原目錄中，此目錄共收錄了24件法隆寺本《貞元錄》寫本，參《法隆寺一切經現存目錄》（稿），收入氏著《日本古代の写經と社会》，東京：塙書房，2006年，付編第187-218頁。

又對上述目錄進行了增補，將大谷大學藏本補入原目錄中，此目錄共收錄了24件法隆寺本《貞元錄》寫本（下表稱“宮崎1”）。在同一書中，宮崎健司撰文討論法隆寺一切經本《貞元錄》，文章中列出的表格與書後的表格相比，缺少其中的兩號，共有22件寫本（下表稱“宮崎2”），但是與伊東本著錄的寫本並不完全相同。筆者將伊東氏以及宮崎氏後來所列的兩個表格作比較，列出以下對照表：

	分類	卷數	所藏	書寫時間	伊東	宮崎1	宮崎2
1	大治本	1	大谷大學	大治三年 12.25	△	△	△
2	大治本	2	法隆寺	大治四年 1.8	△	△	△
3	大治本	4	同朋大學		△	△	△
4	大治本	7	大谷大學	大治四年 2.8	△	△	△
5	大治本	10	同朋大學	大治四年 2.16	△	△	△
6	大治本	12	宮內廳	大治四年 2.24	△	△	△
7	大治本	16	同朋大學		△	△	△
8	大治本	17	大谷大學		△	△	△
9	大治本	19	大谷大學		△	△	△
10	大治本	21	法隆寺	大治四年 4.10	△	△	△
11	大治本	22	同朋大學		△	△	△
12	大治本	22	佑誓寺	大治四年 4.9	△	△	△
13	大治本	24	大谷大學	大治四年 4.15	△	△	△
14	大治本	24	宮內廳	大治四年 3.15	無	△	△

15	大治本	25	同朋大學		△	△	△
16	大治本	26	同朋大學		△	△	△
17	大治本	27	大谷大學		△	△	△
18	康和本	29	大谷大學	康和二年 2.20	△	△	△
19	永久本	29	大谷大學	永久二年 12.17	△	△	△
20	永久本	29	大谷大學		△	△	△
21	未知	29	佑誓寺	無	無	△	無
22	永久本	30	大谷大學	永久三年 3.7	△	△	△
23	康和本	30	佑誓寺		△	△	無
24	康和本	30	佑誓寺	康和二年 3.2	△	△	△

其中有爭議的是第 14 號宮內廳藏卷二四，第 21 號佑誓寺藏卷二九以及第 23 號佑誓寺藏卷三十。宮崎健司提到的宮內廳藏卷二四並非其親見，而是根據田中塊堂《日本古寫經現存目錄》著錄的。宮崎健司本人也懷疑卷二四與大谷大學藏卷二四為重複著錄¹⁰。根據《圖書寮漢籍善本書錄》，《貞元錄》僅著錄了卷一二，而沒有卷二四¹¹。且宮內廳藏漢籍目前已經陸續公佈，僅見《貞元錄》卷十二，未見卷二四¹²。綜合以上情況，宮崎目錄中的《貞元錄》卷二四很有可能即為大谷大學藏卷二四。另外，伊東ひろ

¹⁰ 參宮崎健司《法隆寺一切經と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注 8，收入氏著《日本古代の寫經と社会》，東京：塙書房，2006 年，第 391-418 頁。

¹¹ 宮內省図書寮編《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東京：文求堂書店，1931 年，第 76 頁。

¹² 參“宮內庁書陵部收藏漢籍集覧——書志書影・全文影像データベース”網站公佈的圖版，其中《貞元錄》卷十二的連結如下：http://db.sido.keio.ac.jp/kanseki/T_bib_frame.php?id=007390。

美在他的論文後記中提到，他最初認為佑誓寺藏《貞元錄》共有三卷四種，分別為卷二三一種，卷二九一種，卷三〇兩種。後來得到機會親自調查了佑誓寺藏本，最後確定佑誓寺藏本《貞元錄》共計兩卷三種，分別是卷二二一種，卷三〇兩種。伊東ひろ美氏還在該論文的後記中詳細介紹了佑誓寺藏本的書志學概況。從以上情況來觀察，筆者認為伊東氏的調查更可信，宮崎氏可能未能親自調查佑誓寺本，他對佑誓寺本的記錄應該是轉引自伊東氏的論文。

以上所討論的皆為法隆寺一切經本，除了法隆寺本，由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落合俊典教授主持的研究團隊還對七寺、金剛寺等寺廟所藏一切經進行了調查。根據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所編訂的《日本現存八種古寫經目錄》，石山寺和松尾社古寫經尚未發現《貞元錄》的存在，但《聖語藏》、金剛寺、七寺、興聖寺、西方寺、新宮寺中均藏有《貞元錄》寫本¹³。七寺本存二九卷，其中第二九卷和第三〇卷，也即《貞元錄·入藏錄》經過點校整理，已經出版¹⁴，並由宮林昭彥撰寫瞭解題。宮林昭彥氏的解題繼承了塚本善隆的研究，他校勘了七寺本後，發現七寺本與塚本善隆先生依據的幾種古寫本基本一致¹⁵。

綜上所述，《貞元錄》存在刊本系統與古寫經系統的不同，經過前輩學者研究，與古寫經本相比，刊本藏經本存在增補後代譯經的現象，下文將會詳細探討此問題。

¹³ 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附屬圖書館編《日本現存八種一切經對照目錄》(暫定第2版)，東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附屬圖書館，2006年，第313頁。

¹⁴ 牧田諦亮監修，落合俊典編《中國·日本經典章疏目錄》，收入《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6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98年，第62-117頁。

¹⁵ 宮林昭彥《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二十九·卷三十解題》，收入牧田諦亮監修，落合俊典編《中國·日本經典章疏目錄》，第118-128頁。

二、增竄與刪改——從古寫經到刊本藏經

據筆者管見所及，佛教目錄與藏經研究的專門著作中提到《貞元錄》的僅有姚名達、陳仕強、林屋友次郎、何梅、小野玄妙等幾位先生¹⁶。其中前三位均未談到《貞元錄》的增補和改竄問題，真正對《貞元錄》的文本層次進行細緻分析的從小野玄妙開始。如上所述，小野玄妙參與了《大正藏》的編纂，他搜集了《貞元錄》的兩個日本古寫本，分別為《聖語藏》本和黑板博士藏本。其中《聖語藏》本存卷一至卷二〇，黑板博士藏本存卷二九和卷三〇。他以《高麗藏》本為底本，上述兩個日本古寫本為參校本，撰寫了《大正藏》的校勘記¹⁷。《聖語藏》雖然已出版了CD版，但是價格昂貴，現在國內還不容易看到¹⁸。這兩種古寫本來源十分古老，有可能是以空海從唐代中原地區攜回的寫經為底本，故而具有很高的價值。小野玄妙發現現存《高麗藏》本《貞元錄》經過後人的增補，認為此書不可視為圓照的著作¹⁹。他認為增補

¹⁶ 姚明達先生的介紹較為簡短，僅介紹了《貞元錄》撰作的時間，簡略描述了經錄的結構。陳士強先生對《貞元錄》的結構進行了詳細分析，延續了自贊寧《宋高僧傳》以來對於《貞元錄》的批評，提出了《貞元錄》的三個缺點。其他涉及佛教經錄的著作，例如川口義照《中國佛教經錄研究》、Tanya Storch,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Bibliography: Censorship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ipitaka* (Amherst,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4) 僅述至《開元錄》，而未談及《貞元錄》。林屋友次郎研究經錄的專著《經錄研究前篇》並未涉及《貞元錄》，但他在《佛書解說大辭典》中撰寫了《貞元新定釋教總錄》詞條，他利用了日本的古寫本，但未談到《貞元錄》在圓照之後經過後人改竄的問題，參小野玄妙等編《佛書解說大辭典》第六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33年，第48-49頁。

¹⁷ 小野玄妙：“近處既不可得，僅於《御物聖語藏》拜覽之說中得校對前二十卷，次依黑板博士之藏本對照第二十九、第三十入藏錄之一部分，其餘遂未能接觸其本，因此，《大正藏經》中不得不依《麗本》而登載其全文。”參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第562頁。

¹⁸ 宮內庁正倉院事務所編，高崎直道，築島裕，皆川完一監修，《宮內庁正倉院事務所所藏聖語藏經卷 カラー CD-R 版》（第1-3期），京都：丸善，2001-2010年。

¹⁹ 小野玄妙，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第562頁。筆者認為小野玄妙氏的

的時間在五代之後，因為依據的材料為五代南唐保大四年(946)報恩院恒安纂集的《續貞元釋教錄》。小野玄妙懷疑修訂者實際上就是恒安本人，但是沒有舉出例證。小野玄妙對現行本《貞元錄》的修訂共列出了兩組證據。第一重證據是文獻的內證。《貞元錄》卷一《特承恩旨錄》中收錄了《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十卷，其旁注云“保大中拾遺編上”，證明《貞元錄》的修訂依據的正是恒安《續貞元錄》。此外，《特承恩旨錄》中還收錄了《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七卷及《本生心地觀經》八卷，皆在《貞元錄》纂成之後譯出，定是後來竄入的。第二重證據是兩種日本古寫本的異文。小野玄妙搜集的兩種日本古寫本均沒有記載上述《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及《本生心地觀經》。此外，日本古寫本還保存了《高麗藏》本《貞元錄》刪削掉的與三階教有關的經典。

除了塚本善隆提到的以上版本之外，近年來在整理法隆寺一切經以及七寺等日本古寫經的過程中，還發現了數種以前未見的《貞元錄》古寫本。關於法隆寺本，可參考伊東ひろ美的介紹。他對這些寫本僅進行了書志學的介紹，但沒有對文本層次問題進行討論。

以上述前輩學者的研究為基礎，筆者嘗試對《貞元錄》的修訂問題重新進行梳理。根據小野玄妙和塚本善隆兩位先生的研究，可以將《貞元錄》的版本系統歸納為傳世《高麗藏》本系統和日本古寫本兩大類。其中前者包括初雕《高麗藏》本和再雕《高麗藏》本。後者包括法隆寺一切經本、七寺一切經本等。總而言之，兩個版本系統的《貞元錄》存在兩大差異：一、日本古寫本中包

結論有失偏頗，古書中經後人修改的情況很常見，不可因此認為此錄非圓照所撰，關鍵在於釐清文本的層次，哪些部分為後人所改。

括三階教的一部分典籍，這些經典在《高麗藏》本中被刪去。這點塚本善隆、矢吹慶輝、西本照真以及張總等人已經有詳細的論考，本文不再贅述。二、《高麗藏》本《貞元錄·入藏錄》中有般若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八卷、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等七部五十卷、金剛智譯《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十卷。上述十部經典在日本古寫本中未見，本文討論的主要是這幾部經典。筆者認為這幾部經典數量雖然不多，但是體現了《貞元錄》以後，唐宣宗大中年間唐代新翻譯經典入藏的情況以及南唐保大年間重新組織經藏的嘗試。與此同時，已經作為勘點藏經依據的《貞元錄》形態隨之發生變化，當時的僧人將新入藏經典和貞元錄未載經典附入《貞元錄》，由此產生了《貞元錄》的兩次增竄。日本古寫本因為由空海在貞元二十年(804)左右傳入日本²⁰，沒有反映出大中年間和保大年間的兩次增補，保留了《貞元錄》較為古老的形態。現存的《高麗藏》本則受到兩次增補的影響，導致幾部經典的竄入，已非圓照纂集該錄的原貌。以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考察補入的經典。

(一)《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的譯出

《貞元釋教錄》中較為可疑的兩部經典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和《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根據現行本《貞元錄》的記載，這兩部經典都於貞元六年翻譯，《續開元錄》和《貞元錄》的記載皆相同。然而《宋高僧傳》記載：“至元和五年(810)庚寅，詔工部侍郎歸登、孟簡、劉伯芻、蕭俛等就醴泉寺譯出經八卷，號

²⁰ 《御請來目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卅卷，圓照律師撰。”見〔日〕空海《御請來目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1064頁上欄。

《本生心地觀》。²¹另《宋高僧傳·玄暢傳》記載：“(懿宗時，玄暢)乃奏修加懺悔《一萬五千佛名經》，又奏請《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皆入藏。²²可見《宋高僧傳》的編者認為《本生心地觀經》譯於元和五年，後在懿宗時期由玄暢奏請入藏。《佛祖統紀》載：“(元和)六年，般若三藏譯《本生心地經》，諫議大夫孟簡潤文。帝御制序。”²³志磐《佛祖統紀》認為《本生心地觀經》是元和六年由般若三藏翻譯而成的，並提到當時的皇帝唐憲宗曾為此經作御制序一篇。那麼，《貞元錄》《宋高僧傳》和《佛祖統紀》三者的記載究竟哪種更為準確呢？方廣錫先生注意到《宋高僧傳》與《貞元錄》記載的不同，他認為《貞元錄》的記載更為準確，《本生心地觀經》已於貞元十五年編目入藏，《宋高僧傳》所記有誤²⁴。筆者認為現行本《貞元錄》的記載有誤，應以《宋高僧傳》及《佛祖統記》中的記載為是，依據如下：

1.《貞元錄》的古寫本中未著錄《本生心地觀經》。根據《大正藏》校勘記，《聖語藏》本卷一無“《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本生心地觀經》八卷”十九字，卷一七無“《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一部十卷(貞元六年庚午譯)《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御制序，貞元六年庚午譯)”數字²⁵。這說明在《貞元錄》的早期版本中並無關於此經的記載，這些內容應為後人補入的。此外，按

²¹ (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三《般若傳》，第50頁。

²² (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一七《玄暢傳》，第430頁。

²³ (宋)志磐撰，釋道法校注，《佛祖統紀》卷四二《法運通塞志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71頁。

²⁴ 方廣錫：“《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已於貞元十五年(799)入藏，見《貞元錄》卷一，故此處恐怕有誤”，見氏著《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8頁。

²⁵ (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773頁中欄、第891頁下欄。

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的體例，在《總錄》中，凡是《開元錄》中已經收錄的經典，《貞元錄》一般沿用《開元錄》的記載。而《開元錄》中未收的經典和譯經僧，《貞元錄》除了像《開元錄》一樣附有譯經僧的傳記，同時往往還將僧人奏進經典的奏狀、皇帝允許經典入藏的敕令以及譯經僧的傳記等資料收錄在內。但是《貞元錄》卷一七《總集群經錄》中圓照並沒有提供《守護界主陀羅尼經》和《本生心地觀經》入藏的任何史料。

2. 前文《佛祖統紀》中提到唐憲宗曾為此經御制序一篇。《高麗藏》《金藏》、宮內廳藏福州本以及《房山石經》等歷代大藏經皆載此序，但不知何故《大正藏》未載。根據《高麗藏》所載《大乘新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御制序》：“乃出其梵本於醴泉寺詔京師義學大德闍賓三藏般若等八人翻譯，其旨命諫議大夫孟簡等四人潤色其文，列為八卷，勒成一部。……時我唐御宇天下一百九十有四年也。”²⁶ 經序末尾提到的“時我唐御宇天下一百九十四年”表明唐憲宗寫作此序的時間正值元和六年（西元 811 年），與《佛祖統紀》中所載的時間恰好相符。

3. 《大正藏》本《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八末尾有如下校勘記：“元和五年七月三日內出梵夾。其月十七日，奉詔於長安醴泉寺。至六年三月八日翻譯進上。闍賓國三藏賜紫沙門般若宣梵文，醴泉寺日本國沙門靈仙筆授並譯語，經行寺沙門令暮潤文，醴泉寺沙門少諲回文，濟法寺沙門藏英潤文，福壽寺沙門恒濟回文，總持寺沙門大辨證義，右街都勾當大德莊嚴寺沙門一微詳定……”²⁷

²⁶（唐）般若譯《本生心地觀經》，收入《影印高麗大藏經》第 3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第 479 頁。

²⁷（唐）般若譯《本生心地觀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第 331 頁下欄。

《大正藏》此處的校勘版本略符缺失，²⁸ 無法直接得知此條校勘記依據的版本。筆者發現此譯場列位應來源於日本石山寺古寫本，文獻價值很高。根據《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大正藏》本《本生心地觀經》以《高麗藏》本為底本，同時以《思溪藏》《普寧藏》及石山寺藏日本古寫本校勘。²⁹《中華藏》本《本生心地觀經》使用了《高麗藏》本、《趙城金藏》本、《房山石經》本、《永樂南藏》《徑山藏》本諸本作校勘，但諸版本皆無此題記。可見此題記可能不載於諸種刊本大藏經中，而有可能保存於石山寺古寫本中。石山寺本存卷一、卷五、卷八，現藏於日本寺院石山寺中，秘不示人，無從窺得寫本原貌。但大屋德城編纂《石山寫經選》，將《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一的圖版收錄在內，恰好包含此條題記，內容與《大正藏》校記幾乎完全相同。³⁰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根據《石山寫經選》也收錄了此題記。³¹ 從石山寺本題記提供的信息可知《本生心地觀經》的梵夾原藏於禁中，元和五年七月三日此經的梵本從宮中被請出。七月十七日，般若三藏等奉詔在長安醴泉寺翻譯。元和六年三月八日，般若等人將此經翻譯完畢，上呈唐憲宗。憲宗親自為此經作序，經序後來保存於歷代大藏經中。但是寫本中的題記卻被刪削，導致歷代大藏經皆不載此題記。

從以上三則材料，尤其是《本生心地觀經御制序》及該經題

²⁸ 《大正藏》的校勘記往往標注【宋】、【明】、【宮】等字樣表明校勘記依據的版本分別為《思溪藏》《普寧藏》《永樂北藏》、宮內廳藏福州藏等，這些符號在CBETA中稱之為“校勘版本略符”，筆者沿用此稱呼。但是在《本生心地觀經》卷八末校勘記中的校勘版本略符脫漏，因此無法直接得知此校勘記依據的版本。

²⁹ 《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別卷：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一卷，第191頁。

³⁰ 大屋德城《石山寫經選》，京都：便利堂，1924年，圖版六、圖版七。

³¹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1990年，第335頁。

記可確定《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是般若三藏於元和五年開始翻譯，一年後譯畢上呈唐憲宗的。《宋高僧傳》所載元和五年為《本生心地觀經》的始譯時間，《佛祖統紀》所載元和六年為此經譯畢上呈唐憲宗的時間。傳世刊本《貞元錄》皆將《本生心地觀經》的翻譯時間題為“貞元六年”大概是由於此經是後來竄入的。若題為“元和六年”，將與《貞元錄》纂成的時間貞元十五年相抵牾。因此增改《貞元錄》的編者將原來的“元和六年”改為“貞元六年”使原書不致產生明顯的矛盾。

(二)《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的譯出

《宋高僧傳》卷三《寂默傳》云：“釋牟尼室利，華言寂默。……(貞元)十六年，至長安興善寺。十九年徙崇福、醴泉寺。復於慈恩寺請行翻譯事，乃將奘師梵本，出《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卒於慈恩寺。……案《守護國界主經》是般若譯，牟尼證梵本，翰林待詔光宅寺智真譯語，圓照筆受，鑒虛潤文，澄觀證義焉。”³² 根據《寂默傳》的記載，寂默(即牟尼室利)貞元十九年之後移居崇福和醴泉寺，此後又往慈恩寺翻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故此經的翻譯當在貞元十九年以後，彼時寂默參與了翻譯，贊寧的按語表明此經的譯者為般若三藏，牟尼(即寂默)擔任證梵一職。《貞元錄》纂集於貞元十五年，此經的翻譯在此之後，故《貞元錄》載此經顯然是後來補入的，而非圓照著作的原貌。

《嘉興藏》本《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卷一、卷二末載該經的譯場列位。此條題記亦載於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中。池田溫錄文依據的底本為石山寺古寫本，文字較明本為優，

³² (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三〈寂默傳〉，第45頁。

其文如下：“貞元二十年四月八日奉勅於慈恩寺翻譯，故三藏玄奘法師梵夾，³³十一月三日畢，八日進上，闕賓國三藏賜紫沙門般若宣梵文，中天竺國三藏沙門牟尼室唎證梵文³⁴，翰林待詔光宅寺沙門智真譯語，西明寺賜紫沙門圓照筆受，章敬寺沙門鑒虛潤文，興唐寺沙門澄觀潤文詳定，慈恩寺沙門純一證義，慈恩寺沙門衍清奏³⁵並都勾當譯經。”³⁶根據此題記可確定《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譯於貞元二十年，與《宋高僧傳》中的記載相符。

日本僧人空海前往唐土求取佛經，後撰有《御請來目錄》一卷，著錄了他在唐土求得的佛經。其中載般若譯經四部，分別為：“《新譯華嚴經》一部四十卷、《大乘理趣般若波羅蜜經》一部十卷、《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一部十卷、《造塔延命功德經》一卷，右四部六十一卷般若三藏譯。”³⁷空海於貞元二十年來到長安，貞元二十一年，唐德宗敕命其在西明寺居住。元和元年歸國。³⁸故空海在長安收集譯經的時間為貞元二十一年至元和元年。空海來到長安的時候，正值般若剛剛譯出《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所以空海歸國時，將當時般若新譯的經典悉數攜回日本。而《本生心地觀經》譯於元和五年(710)，次年纔敕下流行。空海回國之時尚未譯出，故他的目錄中僅載《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未載《本生心地觀經》。

³³ “梵夾”，明本作“梵央”。

³⁴ “證梵文”，明本作“證梵本”。

³⁵ “奏”，明本作“秦”。

³⁶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第327頁。

³⁷ [日]空海《御請來目錄》，第1062頁下欄。

³⁸ 據空海《御請來目錄》所載《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空海以去延曆二十三年(804)銜命留學之末，問津萬里之外。其年臘月，得到長安。二十四年(805)二月十日，准勅配住西明寺。爰則周遊諸寺，訪擇師依，幸遇青龍寺灌頂阿闍梨法號惠果和尚，以為師主。”見[日]空海《御請來目錄》，第1060頁中欄。該表文上奏於大同元年(806)。“延曆”、“大同”分別為日本平安時代桓武天皇和平城天皇的年號。

(三) 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等經典的入藏

義淨翻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等七部五十卷，古寫本和刊本也存在異文。在古寫本的卷十三《總錄》中，未載這七部五十卷經典，但在刊本中這七部五十卷是收錄在其中的。其中的原委在卷二十五《闕本錄》和卷十三《總錄》中可以窺見。

《貞元錄》卷二五《闕本錄》載：“右七部五十卷，大唐三藏義淨從大周證聖元年至大唐景雲二年譯畢，准長安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勅及景雲二年閏六月二十六日勅，遍入經目。今《開元釋教錄》中無。今欲拾遺補闕編入《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為訪本未足且附此《闕本錄》。”³⁹在卷十三《總錄》中又云：“右此上從《藥事》下七部共五十卷，並從大周證聖元年，至大唐景雲二年以來兩京翻譯，未入《開元釋教錄》，今搜檢乞入《貞元目錄》。於內由欠三卷為訪本未獲，旦附闕本錄中收，切依前遺失，兼誤為別生，故重標於此耳。”⁴⁰可見義淨所翻譯的這七部五十卷經典因為缺少其中的三卷，最初在《闕本錄》中記載，並未收錄進《總錄》中。但後來由於編錄者擔心這幾部經典被誤會為別生經典，又重新在《總錄》中記載，導致了古寫本和刊本兩個版本的文字差異。古寫本反應的可能是《貞元錄》較為原始的面貌，刊本反應的是《貞元錄》修訂之後的面貌。

³⁹ (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5冊，第985頁中欄至下欄。

⁴⁰ (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5冊，第868頁下欄至第869頁上欄。

(四)《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的入藏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序》所言，金剛智將此經梵本送給梵僧目叉難陀婆伽，後金剛智去世，此經祇翻譯了一半。慧超於建中元年(780)將經本攜至五臺山乾元菩提寺，由不空續譯。

圓照撰《貞元釋教錄》以後，五代時期，南唐僧人恒安撰《續貞元釋教錄》(以下簡稱《續貞元錄》)。據該錄卷末所附上《表》，此錄原題為《大唐保大乙巳歲續新譯貞元釋教錄》，恒安於南唐保大三年，將此錄進呈給皇帝。題為《續貞元釋教錄》，實際上意為此錄接續《貞元錄》而作。從《續貞元錄》所收經典來看，該錄所收皆為《開元釋教錄》未收的經典，包括《貞元釋教錄》中入藏的經典與南唐時期新入藏的經典。《續貞元錄》中記載了《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入藏的情況：

右一部十卷。亦是大弘教三藏金剛智開元二十八年於長安薦福寺譯，其經首《序》記分明。但(恒安)昨者遊禮五臺山，回於關右已來，尋訪抄寫得所將到《貞元錄藏》經文之時。於彼方《藏》內，甚見其經為《貞元錄》中遺漏不載，云於金剛智《廣行記》中具述，為訪《行記》不獲，遂不寫到。今於大唐保大三年冬，伏蒙天恩，於闕下升元寺寫錄所將到貞元經文，編錄入藏流行。於升元寺西藏院又見此經本，遂乞編入《貞元藏》內。三藏金剛智先譯經文，本部經中收，依日施行，福資那國，具其事由，乞以上聞，伏奉令旨，許以施行，編於藏內，仍續已具，計數奏聞訖。今又慮年月浸遠，依前遺失，故寄編於此耳(況金剛智三藏於《開元》《貞

元》二目中甚有所譯經文，已計流行目錄)。⁴¹

此經即前文提到的《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恒安在五臺山訪求藏經時，見此經不收於《貞元錄藏》，欲求經本，但未訪得。回到南唐之後，在升元寺西藏院發現該經的經本，編入《貞元錄藏》中流行。現存刊本《貞元錄》的面貌在恒安的影響下形成。

餘論

通過梳理《貞元錄》的相關刊本和古寫本，可將其版本大致劃分為刊本系統和日本古寫本系統，兩個系統的文本差異主要在於般若和金剛智等人的譯經刊載與否。考察古寫本和刊本系統的異文，可以發現異文的形成與經錄的編纂、修訂均有關係。後世經錄的編纂會影響到前代經錄的文本，經錄文本在這一過程中呈現出較強的流動性。經典的翻譯、經錄的編纂和修訂、經典的入藏過程皆在這一異文網絡中得以呈現和進一步挖掘。

⁴¹ (南唐)恒安《續貞元釋教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1049頁下欄-1050頁上欄。